

策展手记

从“器物实证”到“文明阐释”

以“宝韵流芳——九江地区博物馆馆藏文物精品联展”为例

熊晓县 陈昱廷

问题缘起：区域史如何对话整体史

21世纪以来，长江文明研究成为理解早期中国“多元一体”格局的关键领域。但与黄河流域以中原为中心的连续叙事相比，长江中游段因考古发现分散、文献记载稀缺，“关键节点”区域综合展示长期缺位。地方博物馆陈列展览多采用“编年+精品”模式，观赏性强但问题意识弱，难以与文明史核心议题有效对话。

九江襟江带湖，新石器时代起即处于文化交汇锋面，商周时期因铜岭铜矿成为中原王朝战略资源要地，汉唐后是北人南迁、佛教华化与理学传播的核心走廊，历史序列完整、文化层累清晰，有“以小见大”的学术潜力。但此前未有展览系统整合九江全域文物资源，也未将区域历史升维为理解长江文明整体进程的理论样本。

“宝韵流芳——九江地区博物馆馆藏文物精品联展”的策展初衷，即在于以考古前沿成果为基础，以“问题为导向”的物质遗存为证据链，构建可验证、可延伸的区域解释模型，实现从“地方志”向“文明史”的叙事升维，从“器物实证”到“文明阐释”的学术定位，直接触及了当代中国博物馆学从“物质保管”向“意义生产”转型的核心议题。

学术依据

展览遴选九江地区12家博物馆百余件文物精品，分为“史前先秦篇：襟江带湖·文明序曲”“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篇：江河要津·融合兴盛”“隋唐五代十国篇：北人南迁·文化熔炉”“宋元篇：文风鼎盛·书院千年”“明清民国篇：商贸枢纽·开埠转型”五大篇章，系统梳理九江地区史前至民国的考古成果与区域文物，构建“器物—历史—文明”的解读逻辑，聚焦九江与长江文明的互动发展脉络，呈现九江从史前至民国的演进轨迹，展现九江在不同历史阶段作为区域行政中心、军事重镇、商贸名城、文化高地的独特风貌，通过物质遗存实证，回应“长江中游文明起源与演进”“南北互动与江南崛起”“传统市镇的近代转型”三项重大学术议题，深化对九江地区历史地位、长江文明区域互动及中国南方地区文化发展脉络的学术认知。

学术理论依据可追溯至张光直先生提出的“中国相互作用圈”理论，强调各区域文化在交流中形成多元一体的文明格局，而九江是长江中下游文化交流的“中介点”；同时，九江依托长江、鄱阳湖的水运优势，成为北人南迁、南北商贸与文化传播的关键节点，其特征与历史地理学研究普遍共识“交通枢纽型城市的文化特质源于区域间的物质与精神互动”相符。

展览学术建构的核心价值在于将社会考古学和历史地理学的前沿理论应用于展览实践，以“地理枢纽—文明互动”为叙事框架，将九江置于长江文明的宏大视野中进行解读，为理解九江历史提供全新视角。

叙事策略

理论模型：“地理枢纽—文明互动”的跨学科融合

展览借鉴“社会考古学”理论与“多尺度社会演化”理论，构建“地理枢纽—文明互动”模型，将九江定义为“资源—交通—文化”三重枢纽叠合节点，探讨九江作为地理枢纽在不同历史阶段与环境的相互作用，理解长江文明中段历史演化过程中区域文明与整体文明之间的动态关系。

资源层面：瑞昌铜岭铜矿为商周中原王朝南扩提供驱动力；交通层面：长江与鄱阳湖构成南北物资与信息传输的“高速走廊”；文化层面：庐山佛教、白鹿洞书院及明清米茶贸易，分别对应信仰、教化与市场的整合机制。

该模型核心价值在于将区域内部演化与宏观文明进程耦合，既解释本土社会对外部文明的接受、改造与输出，也揭示宏观历史在地方的物质投射，为区域史与整体史互动研究及跨学科展览叙事提供新视角，其思想内核散见于多学科领域，能打破线性叙事局限，应用前景广阔，但需策展团队具备跨学科分析能力。随着地理空间数据、数字人文方法的发展，该模型有望从理论构想转化为强大的策展工具。

器物实证：区域历史的物质坐标锚定

传统展览常将文物视为孤立的审美对象或年代标尺，本次展览实现“实证”转向，通过重构物与人的关系网络还原历史现场，突破传统地方史志依赖文献的局限。

展览以严谨的器物遴选与考古实证为基础，为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风貌、技术水平与文化特质建立物质坐标，与20世纪中国考古学物质文化研究深度关联，契合当代博物馆学“物证—情境—阐释”三位一体范式，将文物视为承载社会关系的“行动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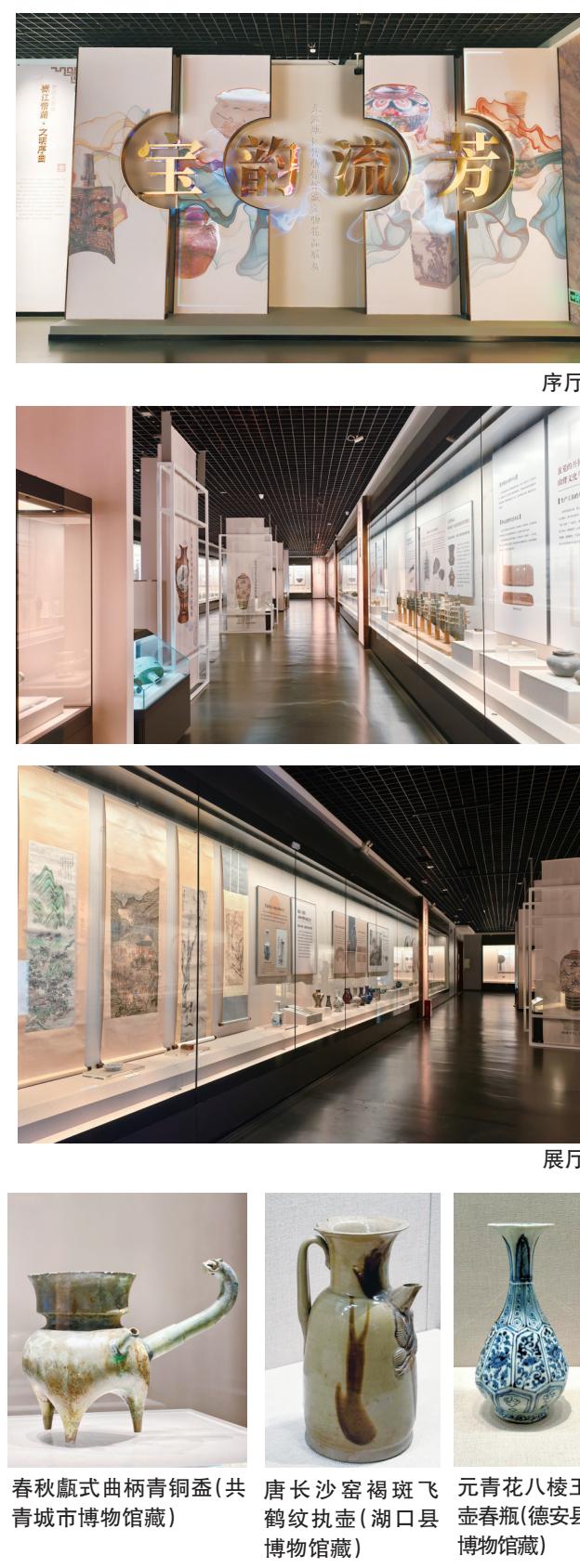
展览遵循“时代覆盖完整性”“功能类型多样性”“区域特色凸显性”“学术价值重要性”四大原则筛选展品。时代上实现史前至民国无断层覆盖，涵盖生产工具、礼器、日用器、行政器具等多元品类；优先选择瑞昌铜岭古铜矿木辘轳、“东林寺”陶艺、影陶罐等地域标识文物，重点遴选三彩胡人俑、青花塔式盖瓶等支撑核心学术议题的展品。科学筛选摆脱“精品堆砌”误区，每件展品都是解读九江历史的关键物证：陶网坠反映史前渔猎经济，龙首青铜鎣斗体现东晋军事要津地位，烧钞库印证元代行政与商业中心价值，共同构建起九江历史发展的物质坐标。

文明阐释：从区域叙事到文明对话的进阶

展览突破器物断代分期传统，进行长时段、跨区域、跨学科整合研究，实现从“区域叙事”到“文明对话”升维，与当代博物馆学界倡导的“展览作为研究平台”理念一致，即将策展视为知识生产过程，标志着区域博物馆策展理念从描述性向解释性升级，这是展览超越地方史、跻身长江文明研究核心的关键。

在“长江中游文明起源”议题上，依托铜岭古铜矿与莽麦岭遗址考古成果，提出“资源控制推动区域文明崛起”视角，铜岭铜矿的规模化开采为长江中游政体提供经济基础，商代青铜器与中原礼器的相似性印证跨区域交流。在“南北互动与江南崛起”议题上，唐白釉执壶与越窑青瓷的共存，反映北人南迁带来的物质需求与技术传播；三彩胡人俑揭示丝路文化与江南本土文化的碰撞，证明九江的“节点城市”地位；宋代白鹿洞书院相关文物阐释其在理学传播与文化重心南移中的作用，与余英时“宋明理学世俗化转向”理论呼应。在“传统市镇近代转型”议题上，明清龙泉窑、德化窑

(作者单位：九江市博物馆)



本版责编：崔波 王龙雷 甘婷婷

深化馆校协同育人 共绘文博教育新篇

——2025年“新时代馆校合作创新实践”工作研讨会综述

何宏 郝靓瑶

2025年12月23日，由陕西省文物局指导，陕西省博物馆协会主办，陕西省博物馆协会社会教育专业委员会（简称“专委会”）与汉景帝阳陵博物院共同承办的“新时代馆校合作创新实践”工作研讨会在汉景帝阳陵博物院召开。研讨会汇聚了陕西省文物局、陕西省教育科学研究院、陕西省博物馆协会以及省内外博物馆、中小学、教研机构的专家学者与一线工作者80余人。会议旨在落实教育部等十七部门《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工作方案》及陕西省实施方案，系统总结馆校合作经验，聚焦现实问题，探索创新路径，推动博物馆教育与学校教育深度融合，为新时代协同育人注入新动能。

陕西省文物局二级巡视员王金青系统阐述了新时代博物馆教育的定位与方向。陕西作为文物大省，始终遵循“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文物工作要求，以馆校合作为重要抓手，推动博物馆教育实现从侧重学校联动向覆盖全民协同育人、从器物认知教学向文明传承共育的深刻转变。通过馆校紧密协同，陕西各文博单位依托课程开发、“双师课堂”、数字赋能及基地共建等创新实践，有效促进了博物馆资源与学校教育的深度融合。必须坚守教育本位，持续推动文物资源转化为优质教学资源，并通过完善长效机制、深化资源共享，系统提升育人成效，为文化强省建设注入持久动力。

陕西省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邵国希认为，馆校合作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举措，是打破传统教育边界、实现社会资源与学校教育深度融合的必然要求。当前陕西馆校合作虽已形成一定基础，但仍存在系统性不足、课程化融合不深、机制不健全、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为推动馆校合作迈上新台阶，他提出未来应着力推动合作“体系化”、资源“课程化”、学习“实践化”、师资“专业化”、运行“常态化”。通过建立馆校合作联盟、开发标准化课程模块、创新实践模式、强化师资共育、健全长效机制，将博物馆的“立体教科书”功能深度融入育人全过程。

陕西省博物馆协会副会长、汉景帝阳陵博物院院长李举纲指出，馆校合作已从“自发探索”阶段迈入“制度化、规范化、全域化”新阶段，是博物馆履行社会责任、彰显社会价值的必然选择。他以汉景帝阳陵博物院“博·悟”系列课程为例，展示了馆校协同育人的实践成效。他说，必须提升认识，将社会教育作为串联各项业务的纽带，推动博物馆资源向可课程化、可读本化的教学资源转化。当前馆校合作仍存在机制化水平不足、内容衔接不紧等问题，呼吁以“教联体”建设为契机，深化协同联动与机制共建，推动馆校合作持续走深走实。

主旨报告环节由陕西省博物馆协会社会教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贺华主持，四位来自博物馆与教育领域的专家，从不同角度分享了馆校合作的前沿理念与实践经验。河北省博物馆学会理事长、河北博物院社会教育部主任刘卫华围绕“馆校协作教育项目的开发理念、探索与展望”，系统阐述了馆校合作教育项目开发的核心理念与实践路径，为深化馆校合作提供了有益借鉴。陕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历史教师卞润粹在《中学地方史教学与博物馆资源的应用》报告中，结合一线教学实践，展示了博物馆资源与地方史课程有机融合的具体方法与实施成

效。西安市碑林区南门小学校长李宁以“新时代学校视角下馆校共育的认知与求索”为题，从学校主体视角出发，分享了学校如何主动对接博物馆，利用场馆资源拓展育人途径的思考与做法。上海科技馆科学传播中心主任宋娴通过《国内外博物馆馆校合作的现状与趋势》报告，分析了国内外馆校合作的最新动态与典型案例，其介绍的“一平米博物馆”等创新模式为陕西馆校合作的深化发展提供了重要借鉴与思路拓展。

在交流发言环节，陕西省内四家博物馆的代表结合自身实践探索，分享了馆校合作的一系列优秀实践案例。西安博物院社教负责人张莉以“探寻博物馆社会效益新范式——以‘博物启智文化润心’陕西省社教成果展为例”为题，通过集中展示全省社教成果，为整合文博资源、推动博物馆教育从活动化向体系化发展提供了重要示范。陕西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部长蔡琳的《解码文物美学构建美育新境——陕历博“画里有话”系列教育课程的探索与启示》，聚焦美育领域，分享了如何深入挖掘文物美学价值开发馆校合作课程。铜川市博物馆馆长张创升的《研学微课的开发路径与实践探索》，聚焦数字化背景下博物馆教育的创新形式，分享了具有示范意义的可行方案。汉景帝阳陵博物院社教部主任郭子钰以“馆校协同育人模式创新实践——汉阳陵‘博·悟’系列课程”为题，系统介绍了该院覆盖小学全年级的馆校协同课程体系，通过双师课堂、主题研学等方式，展现了博物馆资源与学校教育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

分组讨论由专委会副主任农茜、秘书长何倩、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副馆长阴玲玲主持。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当前陕西省博物馆馆校合作发展已基本实现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全学段覆盖，课程形式多样、内容层次丰富，呈现出持续推进的良好态势；但同时也存在资源配置不均、专业力量不足、合作深度不够等共性问题。对此，代表建议，未来应着力推动项目、课程、人员与评价的多维深度融合，强化机制创新与政策保障，通过共建标准化课程资源包、完善“双师”协同机制、搭建资源共享平台，并积极探索将馆校合作纳入教育评价体系，从而构建常态化、可持续的协同育人新格局，为实现博物馆教育与学校教育的深度融合开辟有效路径。

陕西省博物馆协会社会教育专业委员会主任何宏作会议总结指出，本次研讨会是贯彻落实教育部、国家文物局等十七部门《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工作方案》精神的具体实践，通过全省文博单位与学校代表的深入交流，以及馆校双方专家的案例分享与趋势分析，有效凝聚了协同育人共识，为馆校合作从活动化向课程化、系统化转型提供了重要思路。新时代馆校合作应致力于构建“家、校、馆”协同育人生态，推动合作领域向学前与高等教育延伸，通过建立常态化、课程化、品牌化的深度融合机制，将文物资源有效转化为育人资源，共同为提升青少年文化素养、增强文化自信贡献力量。在下一步的工作中，专委会将积极争取政策与资金支持，重点推进专业人才培养、跨馆联动资源整合共享、“一对一”精准指导等工作，持续打造“双师课堂”等品牌项目，并推动跨区域教育协作，为构建馆校协同育人新格局提供有力支撑。

(作者单位：汉景帝阳陵博物院)

我的丝路缘

——写在《丝路寻迹·广州卷》出版之际

程存洁

近日，文物出版社给我寄来了《丝路寻迹·广州卷》样书。我的心情很激动。拙稿得以出版，我向读者简要介绍一下此书的写作缘起、思路与结构安排。

我关注丝路问题，既有学术渊源，也有工作原因。在读书阶段，我虽然选修过相关课程，但对丝路学一直处于一知半解中。工作后，随着接触到的相关历史文物和参加的丝路活动越来越多，我对丝路学的理解也越来越深刻。

记得1991年2月9日至11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秘书处与各国专家学者组成“海上丝绸之路”考察队来广州考察，我有幸参与部分接待工作，参加了“广州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展览工作，还参加了广东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和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在东方宾馆举办的“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聆听了与会中外专家学者的精彩发言，对丝路学有了新认识。

新千年初，我从美国学习回来后不久，接到一项赴英国接受英国公民捐赠中国外销通草画的重要任务。在时任广州市文化局副局长陈玉环的带领下，我们顺利完成接收任务，并于2001年9月在广州举办了“西方人眼里的中国情调：伊凡·威廉斯捐赠十九世纪广州外销通草纸水彩画”展。这是全球首个中国外销通草画展。伊凡·威廉斯先生向广州捐赠了70幅通草画。这次捐赠不仅填补了中国大陆该项收藏空白，也拉开了社会各界关注外销通草画的序幕。

通草画作为我国外销艺术品，是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一项重要成果。此次任务，不仅拓宽了我的学术视野，也促使我开始追溯外销通草画的历史。2002年5月经过不懈努力，我在贵州省遵义市仁怀县茅台镇找到了这批通草画的原产地。



程存洁著《丝路寻迹·广州卷》
文物出版社
2025年11月

偏僻山沟寻觅到外销通草画使用的绘画材料。这次发现，不仅解决了通草画研究中的核心难题，也开启了我深入研究通草画史的大门。2008年拙著《十九世纪中国外销通草水彩画研究》出版。该书出版后，先后荣获2008年度全国文博考古最佳论著和第八届广东省鲁迅文学艺术奖，获得社会广泛认可。此后，随着新材料的不断发现，我对包括通草画在内的外销画历史又有了一些新认识。这些认识见于本书。

两千年来，广州一直是国际贸易大港，长盛不衰，与世界的联系十分密切，其丝路问题不仅繁杂、涉及面广，而且内涵丰富。本书采取“详我略，人略我详”的原则，重点介绍个人对广州丝路问题的原创性研究成果。写作过程中，我始终牢记中山大学历史学系蔡鸿生老师教导的“探讨历史上的中外文化因缘”“要以人为本”的原则，紧紧围绕与丝路相关的人、事、物等展开。

全书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行商散商踪迹”，以新见碑文与文书等文物资料为线索，寻觅19世纪上半叶广州行商与散商的历史足迹，丰富了广州丝路贸易担当的活动轨迹。第二部分“外销画里的大千世界”，围绕包括通草画在内的外销画中所见清代市井风情、街头行业、节日风俗、岭南庭园、室内装饰、外来物品等内容，深入探讨文明交流互鉴影响下的港口风情，还提出了利用外销画作为历史材料应注意的一些问题。事实上，一幅外销画，就是一部全球史。第三部分“外销瓷里的中西文明”，主要谈外销瓷器中所见的中西文明交流互鉴成果，如瓷器的西式造型、西洋纹饰等。第四部分“植物、思想文化与科技交流”，虽然涉及的时间跨度较大，但内容主要集中在广州汉唐时期外来植物、佛教起源与本土化、晚清天文历学成就与传教士公墓调查等领域，还有反映改革开放初法国委托广州承接中华帆船“华·埃尔夫”号建造始末这项内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外销画与外销瓷的征集工作中，英国友人伊凡·威廉斯、外籍华人赵泰来、瑞典友人甘文乐、广州迪士普音响博物馆馆长王恒等纷纷伸出援手，捐赠藏品，极大地丰富了馆藏。本书中的相关内容就是谈论这些捐赠品。

本书虽说已完成，但实际上缺漏甚多，比如外销漆器、外销银器等这类融通中西艺术风格的艺术品，书中完全没有涉及。本书在体例方面，各部分的分配也不均衡，有详有略。本书旨在对地处文明交流互鉴前沿的广州的丝路遗迹妄述管见。三十多年来我在丝路学上的探索，至多只是在前人没有注意到的或尚有疑义的问题上做出了一点补遗而已。

(作者单位：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